

中国式现代化引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研究^{〔*〕}

朱碧波

(云南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云南 昆明 650500)

〔摘要〕现代化浪潮是标识人类文明进步的世界性潮流。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需要引导各民族走向现代化。毕竟,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永续发展需要现代科技的赋能,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良序运转需要现代法治的护佑,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身份认同需要现代化的模铸,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人文传统需要现代性的转化,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世界想象需要经受现代化的考验。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虽然需要现代化的赋能,但这种赋能的现代化并不能是西式现代化。西式现代化不但导致人的异化、族裔撕裂与血腥殖民,而且深陷宰制自然的迷思,习惯性地欺凌自然并引发自然的反噬。西式现代化的资本逻辑与文明等级,决定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必然要拒绝西式现代化而走向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满足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致力追求共同富裕的目标诉求、契合以人为本的人文理想、符合永续发展的生态要求、满足协和万邦的天下想象。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唯有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之下,方能迈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康庄大道。

〔关键词〕现代化;西式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DOI:10.3969/j.issn.1002-1698.2023.11.003

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各民族长期交往交流交融而成的族类共同体。它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性资源和依托性力量。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政治诉求,决定了当前我国要持续不断地展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打造各民族亲如一家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不过,面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交织,当前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正面临各种外源型风险与内生型风险复合叠加的双重挑战。放眼全球,一些西方大国始终无法超脱修昔底德陷阱的迷思,他们致力将西式发展模式装扮成人类历史演进

的黄金定律,试图展开西式现代化叙事、文明叙事、民族叙事的理论殖民,制造中华民族主流叙事话语的合法性危机。诉诸国内,各民族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结构性风险滋生的渊藪。各民族共同富裕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无法回避的焦点性议题。中华民族共同体遭遇的时代难题,使得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议题。尤其是2021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提出“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推动各民族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大论断之后,学界研究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作者简介:朱碧波,法学博士,云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兼职研究员。

〔*〕本文系国家民委专项课题“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理论体系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的关系研究”(2023-GMG-014)的成果。

的热度更是迅速走高。当前学界立足“本体”与“意识”的理论架构,强调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要立足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妥善处理民族多元性与中华民族一体性之间的关系,打造各民族相互嵌入的格局,借助数字赋能和媒介革命,不断增进各民族的共同性,强化各民族的精神纽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学界相关研究体现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知识体系自主性生产的自觉,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了智力支持。不过,当前相关研究偏重思考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结构性基础”和“驱动性力量”,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现代化走向”和“引领性力量”尚未得到足够关注。有鉴于此,本文试图聚焦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现代化走向”与“引领性力量”,展开中国式现代化引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理论思考。

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何以需要走向现代化

现代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的历史过程。工业革命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使得人类社会得以创造现代化的交通工具和世界市场,推动人类普遍交往和世界历史的出场。现代化推进生产力增长的技术优势,使其在全球性扩散中产生了无远弗届的影响力。任何一个民族,如果不想灭亡的话,都必须接受现代化的挑战。现代化乃是每一个民族无法规避的历史性命运和无法拒绝的历史性抉择。中华民族共同体若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必然要顺应世界发展演进的历史性潮流,谱写中华民族现代化的时代篇章。

其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永续发展需要现代科技的赋能。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让各族群众都过上好日子。不过,当前我国还面临着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各区域均衡发展和各民族共富共享依然任重道远。这个问题堪称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至为复杂的戈迪亚斯之结。在这个关键性难结的破解之中,现代化无疑是一把至关重要的钥匙。众所周知,现代化是科学技术不断进步的现代化,科学技术

是现代化的引擎。纵观近代人类社会演进的历程,无论是第一次科技革命蒸汽机的横空出世,还是第二次科技革命电力技术的狂飙突进,抑或是第三次科技革命网络技术的迭代更新,都带来了社会生产力的跃进和社会形态的嬗变。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称之为的:“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革命的力量。”^[1]及至当今,随着全球科技创新进入空前密集的活跃期,新一代信息技术、生命科学、能源技术加速演进,日益深刻地改写人类生活的图景,不断丰富人类生活的可能性。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科学技术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深刻影响着国家前途命运,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深刻影响着人民生活福祉。”^[2]现代科学技术与人民生活福祉的正向关联,决定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必须充分拥抱现代科学技术,以高质量科学技术供给为支点,展开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建设,抹平边疆区域与核心区域的信息鸿沟,推动边疆民族地区与沿海内陆地区的协调发展,满足各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其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良序运转需要现代法治的护佑。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各民族共生共在的族类共同体。各民族成员社会关系的协调和行为习惯的塑造,是中华民族共同体良序运转的基础。在中国传统社会,这种社会关系的协调和行为习惯的塑造,主要体现为熟人社会的礼俗之治。然而,随着传统中国转型为现代中国,各民族差异化的礼俗文化随着彼此社会交往程度的加深而出现文化的敏感和规则的抵牾。现代中国的治理逐渐从传统差异化的礼俗之治转向统一规范成文的法令之治。这种法令之治的优良体现在“法律存在的最为根本的理据在于它是人世生活的规则,堪为对于人世生活的网罗和组织而蔚成人间秩序,从而为居民的洒扫应对提供一个规则之维”。^[3]进而言之,法治是集体慎思的理性之治和群体智慧的规范之治,它在建构社会规范、保障民族权利、维护公民权利等方面具有传统礼俗之治所不具备的优势和功能。中华民族共同体和中华现代国家乃是一个硬币的两面。

中华现代国家以法治为立国之本,决定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良序运转必然要寻求法治的保驾护航,即致力民族事务法治化和宗教工作法治化,将法律规制作为评判各民族成员是非对错的基本尺度,以法治促进和保障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大团结。

其三,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身份认同需要现代化的模铸。中华民族共同体具有“多元一体”和“全民一体”的双重属性。^[4]中华民族共同体既是多元民族互惠共生的族类共同体,又是各个公民相亲相爱的公民共同体。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目标导向,就是引导各民族超越小我身份的束缚,而将自我的政治忠诚指向更为宏阔的大我身份。这就决定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必须整合各民族成员多元而弥散的身份认同,推动各个民族群体形成共有的无差别的公民身份。唯有如此,各民族群体才会生成深厚的宪法爱国主义,并在公民责任伦理的激活之下,自觉献身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壮丽事业。唯有如此,各民族群体才会在共有的公民身份认同之下,完成彼此心理边界和社会边界的跨越,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不可或缺的中华民族一家亲的亲近感和内群体偏爱(In-group bias)。为了达成此种目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就必须借助现代化的赋能,展开公民身份认同的建构。纵观现代国家的建构历程,现代化堪称是驱动传统国家向现代国家转型的最为磅礴的力量。它以锐不可当之势扩散到整个国家的边缘地带,并将各个边缘地带整合进入全国一体化的市场体系和教育体系之中。在这个过程中,现代化推动传统权威的神圣性去魅,解构依附在君主、领主和地方性权威身上的认同,并借助国家主流文化的宣传与传播,推动多元群体形成现代意义的公民身份认同。现代化建构公民身份认同的效用,决定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必然要借助现代化的势能模铸各民族群体的公民身份认同。

其四,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人文传统需要现代性的转化。中华民族共同体在长期的历史演化

中创造了博大精深的文化体系。中华文化的源远流长又不断反向塑造中华民族共同体,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亲仁善邻、协和万邦的处世之道,惠民利民、安民富民的政治伦理,革故鼎新、与时俱进的精神气质,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生存理念。不过,中华传统文化虽然在“政治上之思想、社会上之思想、艺术上之思想,皆有亭毒六合、包罗万象之观”,^[5]但小农经济时代的物质生产并不足以激活人的主体性意识,反而容易导致自我独立的泯灭和社群对自我的挤压,造就个人的“不被发现”^[6]和“自我压缩的人格”^[7]。因此,若是立足文化的自觉和省思,中华传统文化必须在现代文明的洗礼之下吐故纳新,不断实现自我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这就是严复称之为的:“必将阔视远想,统新故而视其通,苞中外而计其全,而后得之。”^[8]进而言之,“现代化的本质就是人的现代化”,^[9]就是人的主体性、创造性和文明性的发展。人类现代化探索的终极目标就是实现人的现代化,促成马克思称之为的“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为了促成“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在礼敬传统之时,还须秉持旧邦新命之理念,不断吸纳现代文明“理性、科学、自由、人权、民主”理念之精华,再造中华民族“郁郁乎文哉”的恢宏气象。

其五,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世界想象需要经受现代化的考验。中华民族是在独特的半封闭型地理环境中生长壮大的族类共同体。“中华民族的生存空间,最为显著的地理环境特征是疆土辽阔,地域相连,四周为自然屏障所阻隔,内部自成结构的体系,形成一个独特的地理单元。”^[10]这种独特的地理环境,使得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演化形成了独具一格的漩涡模式。中原地区的群体依据其先发优势,不断“把周围的异族吸收进了这个核心”,推动中华民族“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11]在滚雪球似的成长过程中,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了自给自足的经济形态、和而不同的文化理念与协和万邦的天下想象。不过,随着现代化浪潮对人类行动能力的革命性重构,整个人

类社会日益贯通成为一个全球一体化的存在。现代化仿若极具腐蚀力的溶剂,消解国家交往的地理阻隔,推动世界体系的重新书写和国际交往的规则建构。这就是说,现代化解构了中华传统的朝贡体系和天下想象,使得当代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进入了一个世界平等交往的时空场域。这就要求中华民族共同体必须在现代化催生的世界体系而不是传统地理阻隔的天下想象中展开自我的建设,推动中华民族“协和万邦”理念的时代性转化。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必须走向现代化。现代化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渗透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走向现代化,乃是历史洪流之下一一种相互嵌入的双向奔赴。

二、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何以拒绝西式现代化

现代化是世界性潮流,浩浩汤汤,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不过,“世界上既不存在定于一尊的现代化模式,也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代化标准。”^[12]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需要现代化的赋能,但这种赋能的现代化却不能是奉行文明等级和资本逻辑的西式现代化。这不仅缘于西式现代化的简单移植必将导致南橘北枳之后果,而且缘于西式现代化本身难以克服的顽瘴痼疾。

其一,西式现代化的资本逻辑与人的异化。西式现代化标志性的运行逻辑就是资本逻辑。资本本身是善恶并存的矛盾统一体,具有“文明面”和“肮脏面”的双重面向。“资本的文明面”,^[13]指的是资本有利于创造更高级社会新形态生成所不可或缺的各种要素。资本契合人类与生俱来的经济理性,它最大限度地激发人类社会追求充裕生活的动能,不断地推动技术革命的迭代更新,促进人类社会物质生产的持续增长。与此同时,资本又存在难以祛除的“肮脏面”,即“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14]纵观西式现代化的发展演进,始终难以协调资本的“文明面”与“肮脏面”,它无法羁縻资本自我增殖的无限冲动,以致资本成为整个社会运转的宰制性逻辑。面对资本对整

个社会的规训,作为主体性存在的人类个体往往陷入进退维谷的两难境地。个体倘若以一己之力抗拒资本的规训,就有可能降格为现代社会的边缘人,甚至难以维系自我的生存与尊严。个体倘若雌伏于资本这个“世俗的上帝”和“特殊的以太”,^[15]又难免出现主体性的异化和蜕化为单向度的人。不过,人类的生存理性往往又使得这个哈姆雷特式命题获得一个无可奈何的解答,即牺牲自我的主体性而向资本投诚。西式现代化由此“在最下流、最龌龊、最卑鄙和最可恶的贪欲的驱使下完成”^[16]对人的剥削和压榨。人类个体被迫退化为资本增殖链条的一个环节,深陷人为物役和心为形役的困局。这就是马克思称之为的:“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17]“在对资本增殖的追逐与膜拜中遮蔽了现实的身体。”^[18]

其二,西式现代化的群体分化与族际对抗。人类社会现代化的一个共同特征就是自然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王权政治转向民主政治。不过,这种现代化共同特征与不同国家的地域性文化相结合,却产生了大异其趣的发展走向。西式现代化推动自然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崇拜。市场经济是激发社会活力的强劲动能,亦是造就社会分化的幕后推手。多元族裔群体由于文化禀赋的差异,往往对市场经济存在不同的适应程度。西方多族裔社会由此出现劳动力市场分割、平行社会结构和居住空间分异等诸多问题。进而言之,少数族裔并不能媲美主流群体的市场适应程度,难以摆脱社会分化的底层化和生存境况的边缘化,以致社会经济不平等与族裔分化出现悲剧性耦合。与此同时,王权政治转向民主政治的历程中,西式现代化形成了代议制民主、多党竞争、三权分立的制度设计。民主之理念,本意是“多数人的统治”,^[19]“人民自己管辖自己”。^[20]但是,鉴于直接民主的成本高昂与效率存疑,西方国家不断在理论和实践层面推动“主权在民”转化为“选举民主”,再转化为“竞争民主”。民主政治

作为人类矢志不渝的政治理想由此转变成一种政治生活的技术方法。这就是熊彼特称之为的：“民主是一种政治方法，即为达到政治决定而作出的制度安排，其方式就是竞取人民的选票来获得政治决定的权力。”^[21] 民主政治“价值的退场”和“技术的转向”，使得“选票”和“竞争”成为西方民主政治的标志性话语。为了赢得选票和大选的胜利，各个政党都将不同族裔群体视为自己的票仓，竞相扮演成特定族裔群体的利益代言人，引导特定族裔群体支持本党的竞选和上台。这就是说，社会经济不平等与族裔结构出现悲剧性耦合之同时，族裔结构又与多党竞争出现顽固性互嵌。族裔结构的不平等经由多党竞争的激化，更进一步诱发多元族裔的撕裂与对抗。

其三，西式现代化的文明等级与征服殖民。西式现代化是资本逻辑驱动的现代化。西式现代化的资本逻辑虽然注重市场交换，但其原始资本的累积却并非市场交换的自然累积，而是依靠战争、殖民和掠夺加以完成的。西方国家存在一种根深蒂固的文明等级观。这种文明等级观使其依靠战争、殖民和掠夺完成现代化所需原始资本的积累而并不存在心理上的负担。在西方文明等级观的视域中，整个人类社会存在蒙昧民族、野蛮民族和文明民族之分。西方国家，尤其是信仰所谓“白人的宗教”（基督教）的欧洲国家，代表着最高的文明，是通往“文明王国”钥匙的守护者。白人作为天定选民，带有与生俱来的“文明开化的使命”和“宣扬唯一真神”的责任。白人有义务把文明福祉带给“蒙昧”和“野蛮”的部落。那些蒙昧野蛮或未开化的部落想要走上文明坦途的唯一途径，就是接受文明的欧洲人的指导。只有欧洲人向其灌输必要的行为准则和展开基本的素质训练，这些部落或民族才有可能进入文明社会。^[22] 西方国家正是借助“文明征服”的合法性自证和粉饰，通过全球性殖民和掠夺获得的资金、资源、市场和劳力，踏上了现代化之路。西式血腥发展的现代化之路，不仅给殖民地民众带来了持久而深重的灾难，而且给西方国

家的一些少数族裔群体带来近乎毁灭性的打击。正如齐格鲁·鲍曼反思“文明等级、现代技术与国家暴力的合谋”造成的针对犹太人的大屠杀时指出的：“典型的现代社会设计和工程野心与典型的现代权力、资源和管理技术的集中相结合，构成了致命组合”，“现代文明不是大屠杀的充分条件；但毫无疑问是必要条件。”^[23]

其四，西式现代化的征服自然与自然的报复。西式现代化的资本逻辑，不仅表现为对劳动者的盘剥，而且体现为对自然资源的掠夺。西式现代化在人与自然之关系上始终存在挥之不去的功利型人类中心主义。这种功利型人类中心主义强调的是：人是唯一具有理性和德性的存在物，是自然界唯一的主体性存在，一切自然物都不过是没有情感和缺乏内在价值的自在之物。因此，人类以自我的物质性力量改变自然界的初始形态的实践性活动，只是一种无涉应然性道德的实践性活动。换言之，人类认知自然的实践性活动“只涉及事实性的真假判断”而“无关乎伦理性的善恶法则”。人类的实践性活动只需服从“人是目的”的绝对命令，而无须怀有不应有的道德顾忌。^[24]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得到极大提升。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与功利型人类中心主义的结合，最终使得西方国家在征服自然的高歌猛进中，打开了生态恶化的潘多拉魔盒。恩格斯为此警告道：“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25] 及至当今，随着各种生态风险的凸显，西方国家又开始反思性批判“人为自然立法”的理性的狂妄，各种生态中心主义理论纷纷走上前台，倡导尊重生命、敬畏自然，致力疗救自然而实现生态正义。不过，这种生态中心主义既无法全盘清剿功利型人类中心主义，又无法彻底摆脱资本逻辑的掣肘。西方国家由此出现生态保护和生态修复“初心的偏移”。他们以邻为壑，频频将高污染、低利润的中低端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试图确保“资本增殖最大化”和“生

态环境优良化”的兼美。可以说,正是一些发展中国家承担西式生态风险的跨国转移,才支撑了当代西方国家环境治理的神话。

三、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何以走向中国式现代化

西式现代化是西方本土长成的现代化模式,它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目标导向和价值诉求都存在诸多违和之处。西式现代化的资本逻辑背反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人本底蕴,西式现代化的族际对抗逆反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和合共生,西式现代化的文明等级背离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人文情怀,西式现代化的征服自然抵牾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奉行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西式现代化原生的缺陷,决定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并不能寄望于西式现代化的赋能,而只能选择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这是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优势与实践效能复合作用的必然结果。

其一,中国式现代化满足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共同富裕”的目标诉求。共同富裕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心驰神往的社会理想。无论是中华传统话语对小康社会的表述,还是近代康有为对天下大同的阐释,都包含了中华民族对共同富裕千载不衰的向往。中华民族对共同富裕的向往,决定当代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要不断推进各民族共同富裕,确保共同富裕的道路上“一个民族都不能少”。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致力达成的共同富裕,并不能依托无限追求资本增殖的西式现代化,而只能依托追求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中国式现代化。纵观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历程,它始终强调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满足各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谈及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时就提出“共富”理念,他指出:“现在我们实行这么一种制度……是可以一年一年走向更富更强……而这个富,是共同的富,这个强,是共同的强。”^[26]改革开放之后,邓小平不仅提出“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重大理论判断,而且提出实现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方法论”,即“先发展起

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27]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江泽民提出“人民共享经济繁荣成果”。^[28]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胡锦涛强调“走共同富裕道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29]新时代以来,我国进入全面推进共同富裕的历史阶段。习近平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30]“我们坚持把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着力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着力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坚决防止两极分化。”^[31]这就是说,中国现代化发展历程昭示唯有中国式现代化才能满足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致力追求的各民族共同富裕。

其二,中国式现代化契合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以人为本”的人文底蕴。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性条件。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涉及“本体”和“意识”两个维度。其中,本体层面,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强调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推进各民族相互嵌入式居住格局的纵深建构,不断促进各民族跨越式发展和各区域均衡性发展。“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一个民族都不能少。”^[32]至于“意识层面”,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强调的是加强民族团结教育,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引导各族群众牢固树立生死与共、命运与共、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的命运共同体理念。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政治诉求,决定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虽然需要现代化的赋能,但赋能的现代化模式必须满足促进各民族物质富足(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和精神富有(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双重要求。中国式现代化谋求的正是人民的物质富足和精神富有。物质富足层面,它强调的是厚植现代化的物质基础,不断夯实人民幸福生活的物质条件,奠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物质基础。精神层面,它强调的是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加强理想信念教育,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

化和创新性发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中国式现代化追求的物质富足和精神富有,不但全面破解西式现代化资本逻辑的弊病,而且完美契合中华民族共同体“本体建设”和“意识建设”之需。

其三,中国式现代化符合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永续发展”的生态要求。在中华民族发展的千秋大计中,生态文明建设无疑是一个无法绕开的关键性议题。当代中华民族唯有保证后代可以享受不低于甚至高于当代的生态福祉,中华民族共同体才能确保永续发展的生活质量。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生态要求,决定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必然选择“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是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现代化,它深刻体现了中华传统“天人合一”理念与马克思主义生态正义理论的高度契合。诉诸历史可知,中华文明并没有西方文明泾渭分明的主客两分式思维。中华文明在人与自然之关系上,传承千年的乃是人与自然的“天人合一”理念。这种“天人合一”,并非自我意识缺失的主客不分的混沌,而是人类主体性觉醒之后物我交融的体悟。“天人合一”试图表达的是:天人本不相分,人与自然乃是一种息息相关、亲和相爱、不可分割的整体。这就是庄子称之为的:“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王阳明称之为的:“仁人之心,以天地万物为一体”。^[33]因为“人与自然”是一体化的存在,那么人类理当道法自然,敬天爱物,以仁爱之心对待万物,不夭其生,不绝其长。及至当今,中国式现代化超越西式现代化戡天役物的傲慢,它传承中华传统“天人合一”的理念,立足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正义,强调自然不仅是“人的无机的身体”,而且还是“人的精神的无机界”,^[34]创造性提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理念。“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的出场,不但开拓了中华生态文明全新的哲思境界,而且奠定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永续发展的生态之基。

其四,中国式现代化满足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协和万邦”的天下想象。中华民族传统的天

下想象就是协和万邦。协和万邦的理念,深切反映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对整个世界和平合作的憧憬和永恒的追求。它展现了中华先民超越各个邦国与王朝政权的拘囿,折射出中华先民四海一家和命运与共的价值追求。不过,中华民族协和万邦的天下想象与价值追求,受到历史时代之限制,并没有由理想变成现实。及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我国开启独具中国特色的现代化之路,中华民族协和万邦的天下想象才逐渐由朴素的愿景变成可感的蓝图。在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初始阶段,我国就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强调各国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式现代化迈向新的历史台阶,国家秉持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包容理念,致力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新时代以来,中国式现代化踏上新的历史征程,国家发扬中华民族协同万邦的天下情怀,开拓性地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强调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携手世界人民开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这就是说,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协和万邦天下想象的创造性转化和突破性实践。它以远超西式民族国家的格局气度,提出国际社会和平发展的秩序构想,并矢志不渝地倡导和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中国式现代化满足中华民族协和万邦的天下想象,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拒绝西式现代化国强必霸的逻辑,而不断走向中国式现代化倡导的和平发展之路。

四、中国式现代化怎样引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走向中国式现代化,不仅是中国现代化理论逻辑演绎的必然走向,而且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演进的必然抉择。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高度契合,决定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必然要接受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鉴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总体布局是“五位一体”,中国式现代化引领中华民族

共同体建设亦相应地体现为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等五个维度的引领。

其一,中国式现代化以高质量发展引领中华民族共同体经济发展。经济发展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基础性议题,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只有着眼物质条件的不断提升和充分发展,才能持续满足各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边疆民族地区身处国家疆域的边缘地带,是我国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典型之地。边疆民族地区的跨越式发展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经济建设的一个焦点议题。边疆民族地区跨越式发展需要中国式现代化高质量发展的引领。进而言之,首先,中国式现代化以高质量发展引领边疆民族地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边疆民族地区实现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重要支撑就是打造特色现代产业体系。中国式现代化的高质量发展,强调边疆民族地区要以特色资源禀赋为基础,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不断打造深具边疆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其次,中国式现代化以高质量发展引领边疆民族地区的兴边富民。中国式现代化的高质量发展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模式,追求各民族共富共享。为了实现各民族共富共享,中国式现代化强调推进边疆民族地区基础设施条件的全面加强、民生保障水平的不断提升,打通各民族共富共享的最后一公里。再次,中国式现代化以高质量发展引领边疆民族地区的对口支援。中国式现代化的高质量发展,致力追求各个地区各个产业的协调发展。为了达此目的,中国式现代化通过各种对口支援行动和财政转移政策,不断以内源性力量的激活和外源性力量的推动,促进边疆民族地区的跨越式发展。最后,中国式现代化以高质量发展引领边疆民族地区的开放发展。中国式现代化的高质量发展,强调的是“开放发展”,它不断引领边疆民族地区融入国家“一带一路”建设,推动边疆民族地区发挥“一带一路”建设重要枢纽和链接平台的作用,奠定边疆民族地区跨越式发展的基础。

其二,中国式现代化以全过程人民民主引领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政治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一个政治共同体。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政治建设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核心内容。中华民族共同体政治建设的关键内容就是建构各民族的政治认同,推动各民族坚定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高度认同。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有效的民主制度安排,它既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属性,又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全过程人民民主体现了过程民主和成果民主、程序民主和实质民主、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人民民主和国家意志的统一。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真谛就是以人民民主的全链条、全方位和全覆盖,保障公民权利的实现,汇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合力。^[35]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独特价值和实践效用,使得中国式现代化引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之际,十分强调通过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制度设计和实践运转,保证各民族的公民权利和集体权利的实现,进而以此建构各民族的国家认同、中国共产党认同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认同。进而言之,全过程人民民主囊括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全过程人民民主以中国特色的代议民主、协商民主和自治民主,全方位保障各民族的公民权利和集体权利,确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并以此建构各民族的政治认同,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政治建设。

其三,中国式现代化以民族事务法治化引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社会交往。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既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成长壮大的社会基础,又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纵深建构的关键议题。面对新时代以来各民族跨区域大流动的日趋蓬勃,中国式现代化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强调推进民族事务法治化,以民族事务法治化引领各民族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这种民族事务法治化包含两方面意蕴:一是公权机关依法治理民

族事务。法律是国家公共理性和公民集体智慧的结晶,它深刻体现亚里士多德称之为的“免除一切情欲影响的”“中道的权衡”。^[36]法治在保障各民族自由平等和公平正义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这就决定了公权机关开展民族事务治理时,理应秉持法治思维,运用法治方式,坚持依法治理民族事务,以法治保障民族团结,不断夯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法治基础。“凡是属于违法犯罪的,不论涉及哪个民族、来自哪个地区,都要依法处理,不能以民族划线搞选择性执法。”^[37]二是树立各民族公民的法治认同。民族事务的法治化不仅包含公权机关依法治理民族事务,而且涉及各民族公民对法治的理性认同。法治既是保障各民族公民权利至为重要的工具,又是规范各民族公民行为最为基本的准绳。民族事务法治化要求各民族公民将法律作为评判自我和他者行为是非曲直的标准,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拒绝民族意识对法治意识的僭越。

其四,中国式现代化以文化自觉引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建设。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民族和睦之魂。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一个关键任务就是展开中华文化认同建设,推进各民族对中华文化的深度认同,进而以此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当今全球文化交流碰撞的时空场域,各民族对中华文化的认同面临全球化时代滋生的各种解构性压力。这就决定了中华文化认同建设必须持续不断地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借此展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亟须的中华文化认同建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并不能脱离中国式现代化演进的历史情境而凭空展开。事实上,正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引下,中

国式现代化创造性传承中华文化“贵中尚和、求同存异”“厚德载物、自强不息”“惠民利民、安民富民”“亲仁善邻、协和万邦”的文化理念,不断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藏的普遍性价值和时代性意义,奠定各民族群众认同中华文化的基石。与此同时,中国式现代化还不断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性发展。中国式现代化“立足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它植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本体,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不断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性发展,开创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式现代化对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开创,尤其是对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提炼和弘扬,为新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认同建设注入崭新的灵魂和全新的意义。

其五,中国式现代化以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引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生态文明建设。生态文明建设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至关重要的基础性议题,是中国式现代化“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关键点。中国式现代化秉持“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致力通过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生态文明建设。进而言之,首先,中国式现代化推进生态环境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打造中华民族共同体生态文明建设的格局。中国式现代化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党委领导、政府主导、企业主体、公众参与的环境治理全民行动体系,奠定了中国特色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的基本格局。其次,中国式现代化展开生态环境治理的制度设计,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生态文明的规范化建设。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过程中,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出台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探索资源环境统计制度,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与用途管制制度,实施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终身追究制度,以体系周密而便于操作的生态环境治理制度护航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生态文明建设。最后,中国式现代化以生态环境治理能力现代化,优化中华民族共同体生态治理的效能。中国式现代化展开山水林田湖草沙的一体化治理,立

足生态环境治理执法效能的提升、生态环境治理监测能力的增强、生态环境治理的科技保障,全面构建生态环境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支撑体系。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态文明之治,摆脱了西方生态治理中的人与自然异化、生态与资本对立、生产与消费违和,通过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夯实中华民族共同体永续发展的生态之基。

注释:

-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02页。
- [2]习近平:《努力成为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求是》2021年第6期。
- [3]许章润:《法律的实质理性——兼论法律从业者的职业伦理》,《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1期。
- [4]周平:《中华民族的“全民一体”属性》,《思想战线》2021年第1期。
- [5]梁启超:《饮冰室文集》第一册,北京:北京日报出版社,2020年,第265页。
- [6]梁漱溟:《中国文化的命运》,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8年,第165页。
- [7]孙隆基:《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5年,第211页。
- [8]王杖主编:《严复集》第三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560页。
- [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164页。
- [10]《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形成与发展》课题组:《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形成与发展》,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3页。
- [11]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4期。
- [12]习近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必然要求构建新发展格局》,《求是》2022年第17期。
- [1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27页。
- [1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97页。
- [1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1页。
- [1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873页。
- [17][3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56、161页。
- [18]刘同舫:《马克思的解放哲学》,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30页。
- [19][古希腊]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张广智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147页。
- [20][美]科恩:《论民主》,聂崇信、朱秀贤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7页。
- [21][美]约瑟夫·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吴良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1年,第396页。
- [22][澳]布雷特·鲍登:《文明的帝国》,杜富祥、季澄、王程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第13页。
- [23][英]齐格蒙·鲍曼:《现代性与大屠杀》,杨渝东、史建华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年,第104、18页。
- [24]杨通进:《环境伦理:全球话语 中国视野》,重庆:重庆出版社,2007年,第93页。
- [2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998页。
- [26]《毛泽东文集》第六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95页。
- [27]《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3-374页。
- [28]《江泽民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7页。
- [29]《胡锦涛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624页。
- [30]习近平:《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求是》2021年第20期。
- [31]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22年10月26日。
- [32]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编:《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学习辅导读本》,北京:民族出版社,2022年,第114、111页。
- [33][明]王守仁撰:《王阳明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216页。
- [35]朱碧波:《全过程人民民主赋能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1期。
- [36][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年,第169页。
- [37]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编:《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学习辅导读本》,北京:民族出版社,2015年,第125页。

[责任编辑:刘姝媛]